

十字军东征、蒙古军西征与东西方贸易

尹元超

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西征都是封建主的军事扩张活动,但是对东西方贸易所起的作用却显著不同。十字军东征为意大利城市发展利凡特贸易提供了契机,将西欧国家的对外贸易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蒙古军西征却只是使东亚与西亚间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贸易有所恢复,呈现一时之盛,这是东西方国家封建社会具体经济政治结构有所不同所致。有关历史事实同时表明,直至地理大发现前夕,尚未突破几大国际贸易区相对独立,东西方之间的远距离贸易还需分为几个区段进行接力式转运的基本格局。因此,只有当西欧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初步发展,贸易扩张力进一步增强以后,才能最终实现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直接贸易。

11世纪末至13世纪期间,西欧十字军和东亚蒙古军对西亚地区的远征,都是封建主的大规模军事扩张活动。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①,以便对被征服地区居民进行封建性榨取。十字军封建主和蒙古游牧贵族,分别在通过他们的征服活动而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伊儿汗国所推行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充分反映出这两场远征均具明显的封建性质。所不同的只是在耶路撒冷王国,基本上移植了西欧国家的封建领主制;在伊儿汗国,则是通过合赞汗的改革,最终大体上继承了波斯地区伊斯兰封建制度的传统。这是因为,当时孕育十字军的西欧国家,封建领主制社会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业已比较成熟;而蒙古人中的封建关系才刚刚产生,尚未定型,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接受被征服地区传统的影响。但是,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西征尽管都是封建主对西亚地区的军事远征,它们在东西方贸易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有很大区别。

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前,东西方贸易即亚欧大陆东西两侧之间的远距离贸易,基本上是通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即所谓利凡特的中介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以前,西欧与利凡特之间的贸易已在逐步发展。9世纪以前,阿拉伯人虽曾控制地中海大部分水域,然而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一带仍属拜占廷帝国的势力范围。在拜占廷帝国的庇护下,意大利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如威尼斯、腊万纳、巴里、布林的西及塔兰托等,仍与君士坦丁堡以及小亚细亚一些港口有着贸易往来。西欧一位与查理大帝同时代的编年史家说,当查理大帝驻在弗留利的时候,一些从帕维亚来的他的随从人员,穿着五彩缤纷的豪华丝织服装,并披着各种珍奇的毛皮,因为威尼斯人新近从海外将一批东方宝物运入了帕维亚^②。据分析,这些丝绸就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9世纪以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在东方的贸易又进而扩大及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地区。据记载,828年,威尼斯商船已出现于埃及亚历山大港,

威尼斯商人将斯拉夫籍奴隶、达尔马提亚和斯提里亚的铁与木材运往埃及，再从埃及运回香料、丝绸和东方其他奢侈品；10世纪末，阿马尔斐商人 also 到达了埃及和叙利亚港口；11世纪初，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的伊斯兰政权，几乎都已接纳过威尼斯派去的使节。但是，总的看来，十字军东征以前，西欧与利凡特的贸易联系还处于初始阶段。直到11世纪，这种贸易还几乎被威尼斯商人所独占。意大利半岛西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热那亚、彼萨和阿马尔斐等，更不用说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马赛、阿尔和阿维尼翁了，它们的商人虽然随着阿拉伯人退出西西里、撒丁、科西嘉等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基本摆脱了先前被封锁在第勒尼安海湾的困境，但他们的贸易范围还主要限于西部地中海区^⑤，他们的商船通常只航抵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港口，而较少驶往地中海东部地区。如中世纪西欧一位诗人在1063年描述彼萨时写道，它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的船只航行到西西里和非洲各港口；在它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商人，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有”^④。正因为如此，西欧与利凡特之间的贸易量仍然不大，致使威尼斯一只商船往返一次，有时可以获得多达1200%的利润^⑤。

西欧与利凡特之间的贸易开始急剧增长，是在12世纪意大利城市积极参加十字军东征活动以后，有人甚至将这种贸易增长称为“商业革命”^⑥。一则是西欧地中海沿岸，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许多城市都投入了利凡特贸易，彼此展开竞争，其中威尼斯与热那亚的竞争尤为激烈，乃至经常兵戎相见，严重影响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政治形势。如1204年和1261年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及复国，便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争夺拜占廷帝国内东西方贸易权益的斗争有很大关系；1256年至1258年，双方为争夺港口城市阿克，多次发生海战，其初热那亚击沉几艘威尼斯船，后来威尼斯又消灭热那亚停泊在阿克的整个舰队，且不许被俘的热那亚人在3年之内回到叙利亚，最终促成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彻底覆灭。这些意大利城市之间展开争夺利凡特贸易权益的激烈斗争，说明这种贸易对于它们已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另则是从12世纪起至地理大发现前夕，利凡特的东西方贸易量一直在较快增长。据统计，十字军东征活动结束时，由利凡特运往西欧的东方产品，比十字军东征前增加了约10倍。以作为利凡特贸易中主要商品的香料为例，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更加明显。如1017年，有4只载运香料的小船到达威尼斯，曾被时人作为一件大事记入编年史^⑦。而1382年，仅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运往威尼斯的胡椒和生姜，即达约174015公斤，1396年，又增至约319050公斤。到1497年，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采购的胡椒和生姜，更多达约1013000公斤（同时，威尼斯还从地中海东岸其他港口获取大量东方商品，如1497年，威尼斯人在贝鲁特港采购的胡椒和生姜，亦达约905000公斤）^⑧。可见，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欧与利凡特之间的贸易，业已获得了持续增长的比较稳定的基础，因而对从东亚和南亚输往利凡特的东方商品，也便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然而，蒙古军西征对东亚与西亚之间贸易所起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未能促进这种贸易持续增长，使之获得比较稳定的基础。

诚然，蒙古军西征初期，也曾有助于东亚和西亚之间贸易的恢复与扩展，使之空前活跃。13世纪，在囊括东亚、西亚和东欧大部地区的蒙古大帝国境内，充当东西方贸易主要中介者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商人，前往中国者显著增多。当时，从中国内地至利凡特比较通畅的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大都（北京）起，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路，通过中亚和波斯，到达叙利亚沿海地区；一条从大都起，经喀刺和林，沿天山北路，通过钦察草原，到达克里木半岛等黑海沿岸地区，致使蒙古大帝国首府大都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应知汗八里城（北京）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

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尚应知者，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夥，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⑨。同时在中国华北和西北其他城市，也有很多穆斯林商人。他们有的逐渐定居于中国，既从事中国境内的贸易，也经营国际贸易；有的则只是常来中国内地经商，往往住宿在那些定居于中国的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舍中，受到热情招待，甚至合伙经商。这些经陆路前来中国的中亚和西亚商人，大多结队而行，每队数十人、数百人不等，并携带武器自卫。他们运进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珠宝、犀角、象牙、玉器和香料等，输往西方的则多属丝绸、瓷器、麝香及大黄之类。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中国肃州地区生产的大黄质量特佳，外国商人争相购买，“行销世界各地”。

蒙元政权攻灭宋朝，实现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效统治之后，西亚、南亚与东亚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亦较活跃。元朝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贸易港口计有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澈浦、广州、温州和杭州七处，均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从西方循海路前来中国经商的，主要仍是西亚的穆斯林，相继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的蒲寿庚与艾卜伯克·乌马儿，就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此外还有不少印度商人，输入南亚的香料和其他珍异。来到中国的犹太商人，则除了经商以外，还热衷于放高利贷。同时，驶往印度海岸和波斯湾的中国商船也有增加，中国商人除将东亚国家生产的丝绸、瓷器等贩往西亚和南亚外，还将印度洋沿岸地区生产的珍宝、棉布等输入东亚各国，以致成为阿拉伯商人的竞争对手。如印度半岛西南沿海地区富人收集的珍珠，便是“舶至，求售于唐人”^⑩。由于这种海上贸易的发展，东海之滨的泉州和波斯湾上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皆成当时重要的国际海上贸易枢纽。14世纪上半叶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其游记中写道：“泉州城甚大，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中织造天鹅绒及缎，品质均极优良。港中船舶极多，大者约有一百，小者不可胜计。其中回族（穆斯林）商人，则另成一市”^⑪。

东亚与西亚、南亚之间陆地和海上贸易的活跃，无疑有助于整个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西欧的一些使节、商人和天主教传教士，也得以辗转来到中国，开始对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获得某些直接了解。但是，因蒙古军西征而得到一定恢复和扩展的国际贸易，基本上只是东亚与西亚之间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传统贸易的复苏，只有一时之盛，没有发展后劲，未能持续增长。进入14世纪以后，随着蒙古大帝国的瓦解，中国与西亚的陆地通道重新阻塞，往来商队日趋稀少；海上贸易亦呈萎缩之势，中国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城市由7个缩减为庆元、泉州和广州3个，与南宋后期完全一样，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也时禁时开。这样，西亚与东亚、南亚之间的贸易往来，又基本上回复到了先前时断时续的状态。西欧传教士约翰·孟帖·科尔维诺1305年在写于大都的信中，对东西方海陆交通艰险所作的描述，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前来的道路，我向你们报告，以取道陆路，经过北鞑靼的皇帝阔丹（脱脱）的领土较为安全可靠，如与使者们同行，在5、6个月内即可到达这里。但是，如取道海路，则是最为遥远和危险的，因为这样须航行两段海路，第一段，约相当于阿克至普罗温斯省的距离，而第二段约相当于阿克至英格兰的距离，而且，很可能在两年以内还不能走毕全程。然而，由于战争之故，长期以来，陆路已不安全，我没有接到罗马教廷、我们的小教友会和西方国家的消息，已有12年了”^⑫。蒙古军西征浪潮过去以后，西亚与东亚、南亚之间的贸易重新萎缩，仍然只是涓涓细流，当然也便制约着整个东西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东亚和南亚产品及其他财富有着日益增长需求的西欧居民，为了突破利凡特的贸易瓶颈，只得探寻从西欧直达东亚和南亚的海上航路了。

二

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西征对东西方贸易所起的作用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孕育十字军和蒙古军的西欧与东亚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各有特点，致使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所处地位及其活动方式出现显著差别。

在西欧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阶层居民产生了对东方产品日趋强烈的需求。地理大发现以前，东方许多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于西方，是西欧国家需要东方产品的一般前提；西欧内部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则是这种需求不断增长的基本因素。当封建社会初期，西欧各地还处于蛮荒状态时，“封建领地居民的需求，限于普通和粗笨的东西，满足于简陋的住宅和不多的衣服及器具。领主直至公爵和国王的生活也只是略好一点”^⑬。那些从事长途转运贸易的商人，当然只会注视大唐皇帝和阿拉伯哈里发的豪华宫廷，而对满足于粗衣粝食的法兰克国王不感兴趣。但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终于激起西欧各阶层居民对东方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一则农业畜牧业生产率提高，肉畜产量增加，肉类消费量增多。根据西欧的自然条件，必须在秋天宰杀牲畜，因为那时牲畜最肥。可是西欧的气候往往冬季仍较温和，为了长期保存肉类，只得将肉类加以腌制，更常见的是在堆放的肉类上撒敷大量香料。再则，胡椒之类还是当时对付经常发生的瘟疫的主要药物，“它们在长时期里都是各民族希望得到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象水果和葡萄酒那样惹人喜欢，而是因为它们对于保持健康或者治疗疾病不可或缺”^⑭。三则，在货币地租流行，货币收入有所增加以后，封建贵族为了显示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富有，也往往象富裕市民一样，竞相穿着东方丝绸与享用东方珍品。此外，西欧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便增强了西欧商人贩运东方产品时的支付能力。据记载，10至11世纪，西欧业已开始恢复金银矿山的开采^⑮。12世纪以后，西欧运往利凡特的手工业品亦日益增多。例如，14至15世纪，威尼斯商人从利凡特输入的东方产品的总价值，每年约为50至60万杜卡特。他们向利凡特输出的硬币只有约30万杜卡特，其余的进口货款显然是用自己运往利凡特的西欧货物抵付的^⑯。因此，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给西欧地中海沿岸城市，尤其是意大利城市开拓利凡特贸易提供了客观依据。

而西欧地中海沿岸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享有充分自主权，以至成为独立城市共和国，则使它们能够将封建主的军事远征作为自己拓展利凡特贸易的契机。

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是作为独立于封建王权和封建领主的势力参与远征的，所以，参加远征的各国骑士通常融化在大军里，没有组成单独的队伍，但它们却装备了自己独立的舰队，拥有自己的首领，进行独立于大军的航行^⑰。十字军骑士从西欧出发远征地中海东岸地区，不仅需要海上舰队的军事配合，而且不能离开海运装备与粮食。十字军封建主既然没有直属船队可供使用，只得依靠这些城市的海上支援，因而便为这些城市从十字军东征活动中为自己谋取贸易权益开辟了道路。

在第一次东征中，最初几支十字军骑士是沿陆路经拜占廷帝国向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推进的。然而，意大利城市的海上支援也已起着很大作用。例如，1097至1098年，当沿陆路推进的十字军骑士围攻安条克陷入困境时，由于热那亚等城市的几十艘船从西欧运去一批骑士前往援助，才使侵略者的处境有所改善。1099年，由于热那亚船只将大量粮食、酒以及供建造围城塔用的木材运给围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骑士，他们才终于将其攻陷。至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港口城市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泰尔、阿克和雅法等，更是

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舰队直接参战才攻占的。

这些意大利城市既是作为独立于十字军封建主的势力参与东征活动的，又在攻占利凡特港口城市的战斗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在瓜分东征活动的战利品时，它们也便得到了自己独立的份额。早在1101年，热那亚就和耶路撒冷王国缔结条约，规定热那亚可以在每个由于它的援助而攻占的利凡特港口城市里，获得一个居住区和其他战利品的1/3。接着，威尼斯和彼萨等也与十字军首领签订了类似协定。1124年，威尼斯督治多米尼谷·迈克尔亲自率领40艘大艇和28艘铁嘴战舰参加进攻泰尔时，提出的条件是：在每个隶属于耶路撒冷国王的城市里，威尼斯人应获得一条街道、一块广场、一个浴场、一所烘面包房……以及对饮水和面包的适当控制，全部免税；还应使用自己的天秤和度量衡^⑨。耶路撒冷国王只得答应威尼斯提出的条件，并在攻克泰尔后，将泰尔城区的1/3给予威尼斯。威尼斯随即在其占领区内委派一名文官管理民政，委派一名武官负责军事。这样，随着利凡特的一个个港口城市被十字军攻克，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也便在利凡特建立了一系列商业据点。此外，它们还享有在十字军势力所及地区豁免赋税和设立商站等特权。因此，意大利商人初步控制了利凡特贸易。

12世纪上半叶，十字军与拜占廷帝国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通过经由拜占廷帝国的陆路输送兵员和给养十分困难；阿拉伯人的反侵略斗争逐步高涨，又使十字军在利凡特的处境急剧恶化，亟需西欧给予新的支援，因而使十字军封建主更加依赖意大利城市提供海运。例如，第三次十字军围攻阿克时，由于这些城市中中断海运粮食，当地粮价立即猛烈上涨，十字军骑士普遍陷入饥饿境地，不得不宰杀军马充饥，有些骑士为求一饱甚至投向了伊斯兰阵营。而一俟这些城市的运粮船只到达，麦价顷刻即降低了96%。

于是，意大利城市进一步变成了十字军东征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要受益者，使之日益服从它们扩展在利凡特的贸易权益的需要。它们最终迫使第三次十字军放弃了再度攻取圣地耶路撒冷的原定计划，改为以重新侵占更具商业意义的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为主。在十字军重新攻占阿克、雅法和阿斯卡伦等利凡特港口城市后，它们随即恢复了在这些港口的居住区、商站和各种贸易特权。13世纪初，威尼斯基本上左右了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迫使其放弃了进攻埃及的原定计划，改为首先攻占属于匈牙利王国的达尔马提亚的萨拉，以扫除这个妨碍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区进行贸易和航行的海盗巢穴，然后进攻还在影响其全面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东西方贸易的拜占廷帝国。在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廷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后，威尼斯获得了全部战利品的3/4、全部征服地区的3/8、天主教会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职位，以及选举拉丁帝国皇帝的委员会的一半委员名额，成为拉丁帝国的支配力量。此外，威尼斯还占有了拉丁帝国最有利于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城市、港湾和地区。例如，在君士坦丁堡，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地区和金角湾最重要的碇泊所；在色雷斯，占有亚得里亚堡；在马尔马拉海岸，占有罗多斯托、赫拉克利亚和加里波利等沿海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占有其西南部科隆和摩同两个港口城市；在爱琴海上，占有克里特、安德罗斯、纳克索斯与科斯等许多岛屿。因此，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又基本上夺取了拜占廷帝国的商业权益。此后几次进攻埃及或企图先占领突尼斯再向埃及推进的规模较小的十字军东征活动，也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城市商人的鼓动与资助下进行的，旨在借以打通从西欧经埃及到印度和中国的商道^⑩。结果虽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西欧封建主一无所获，却也导致埃及和突尼斯等地的伊斯兰政权与西欧国家签订了几个商业条约，因而亦有助于西欧地中海沿岸城市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贸易的扩展。

同时，意大利城市还得以使恃自己对十字军封建主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利用伊斯兰国

家与十字军骑士直接而尖锐的对抗，以及伊斯兰地区不能割断与西欧的贸易联系的矛盾处境，巧妙周旋，日益扩大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权益。例如，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后，威尼斯通过既运援兵和粮食给东征十字军骑士，又出售武器给阿尤布王朝，从而扩大了与埃及的贸易；后来，热那亚和彼萨仿效威尼斯手法，也在埃及亚历山大与达米伊塔等港口建立了商站。它们甚至使用类似手法渗入叙利亚内地市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伊斯兰政权控制下的城市也设立了支店。

由于意大利城市不是通过十字军东征简单地排挤阿拉伯商人和拜占廷商人，而是以之为契机相对独立地确立了在利凡特贸易中效益较高的贸易体制，所以在十字军封建主东征退潮以后，它们仍能保持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蒙古军西征的有关情况则大异其趣。蒙古人在进行大规模对外征服和建立帝国以前，主要经营草原游牧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缺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因而与农耕地区贸易有无显得极为重要，他们往往将贸易与外交等同起来^{②0}，贸易摩擦很容易导致武装冲突。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进攻中亚，就因花刺子模的讹答剌城守将斩杀蒙古商队成员而起。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也还比较重视工商业。每攻占一地，时有恣意杀戮普通居民的现象；对于工匠，却不加屠杀，只予俘掳，将士报功，亦常称掳获工匠若干。对于往来商人，一般也能给予保护，以致大批中亚穆斯林商人得以涌入中国内地。

但是，蒙古人征服东亚和西亚农耕地区，并在这些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情况很快发生变化。最显著的是随着因征战骚扰而流动的大批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在农耕地区定居下来，改而从事农业，逐渐融合于当地土著居民之中，这些农耕地区重又基本恢复了往昔个体小农自给自足的社会秩序，从而也便继承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体制。蒙古人的统治只是使小生产者受到较强的人身控制，反而增添了一些妨碍工商业发展的落后因素。

在中国，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元统治集团很快接受了“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可以治天下”的中原地区传统思想，日益全面继承汉族封建政权的治国方略，重视恢复和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上，也便加强了国家对工商业的管制，重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手工业方面，普遍兴办各级官府作坊，除战争时期俘掳大量工匠外，平时也经常下令搜括工匠，如1275年括江南工匠30万户，1279年括工匠42万人，1287年又括江南诸路工匠^{②1}，以致将全国大多数工匠集中到了官府作坊里。“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②2}。官府作坊中的工匠称“系官人匠”，另立匠籍，父子世代相承，不得随意脱籍或改业；他们从官府支取物料加工，成品交给官府，实际上处于奴隶或半奴隶地位，因而谓之“工奴”。散落于民间的工匠，也受到官府一定控制，常被差遣。官府作坊生产效率较低，且产品主要直接分配给官衙、军队和贵族使用，很少投入市场。因此，官府作坊的广泛存在，严重束缚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商业活动，蒙元政权也诸多掣肘，还有严重的民族歧视。汉族商人不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商税，而且受到种种限制，例如外出经商必须取得文引，不得私贩铁器，禁止将江南铁器贩往北方，不许私自与番商贸易等等。蒙古和色目商人出入官府，享有特权，可以比较自由地经商，因而几乎垄断了国内贸易。但海外贸易亦逐渐收归官府经营。1314年，元朝当局明令禁止人民私自下番，即使权势和豪富人家自出本钱入番贸易也被处以重罪。此后，或由官府发船招商出海，回来时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泉州等市舶司自备船只和本钱选派商人去海外贸易，则所得利润官府取7分，商人得3分。或遣使“诏谕”海外诸国前来进行“贡赐贸易”，以求获得外国珍奇宝物。手工业和商业既然受到官府严密控制，民间商业资本于是纷

纷转为封建地产，甚至转为高利贷资本，起着进一步巩固自然经济的作用。所以，蒙古人征服初期一度比较活跃的中国与南亚、西亚之间的国际贸易，终于重趋萎缩。

9至12世纪，波斯的城市经济曾经有所发展，各城市之间的商业移民逐渐增多，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正在增强。但这一发展进程被蒙古人的大举入侵和进行统治打断了^②。伊儿汗国初期，波斯社会经济严重衰落，究其原因，一是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大肆屠杀，可能有些夸大的统计指出，仅尼沙普尔、谋夫和布哈拉诸城被杀者即达500万人。二是蒙古人以牺牲农业去发展游牧业，大量农田被改为牧场。三是蒙古人推行竭泽而渔的重税政策，旧税照收，又加新税，有一种称为“塔嘎”的税，其数额是每次交易物品价值的10%左右；有些税一年征收几次，且数额没有固定；还经常征发繁重的劳役。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原来从事东西方转运贸易的波斯和中亚商人，或移居国外，或改操他业。合赞汗的改革使波斯的社会经济开始缓慢回升，但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使伊儿汗国伊斯兰化，主要经济内容是重建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诸如恢复军事封土制，调整土地税，修复因曾妨碍蒙古骑兵自由驰骋而被破坏的灌溉渠道等^④。而对于工商业并未给予特别关注，只是一般地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白银兑换率而已。所以，尽管波斯与拜占廷、威尼斯、热那亚间的贸易，尤其是丝的贸易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伊儿汗国末期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波斯和中亚商人在整个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未超过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西征对东西方贸易所产生的后果表明，封建时代，封建主的军事扩张活动有时可能在客观上促进国际贸易，甚至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获得某些发展。这是因为封建时代进行国际贸易，一般均与享有商业特权联系在一起，而军事征服往往有助于取得这种商业特权。但是，直至封建社会繁荣时期，东西方国家的贸易扩张能力和军事征服能力都还有限，而且由于具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有别，在任何国家里这两种力量的配备也还不太协调。一般说，亚洲有些国家的军事征服能力较强，贸易扩张能力较弱；西欧有些国家则贸易扩张能力较强，军事征服能力较弱，因而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任何国家，当时都还不能实现对另一端国家的军事征服和直接贸易。因此只得假以时日，等到15世纪末期，西欧国家随着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初步发展，既进一步增强了贸易扩展能力，又具有一定海上军事力量，才得以完成地理大发现，使全球海道大通，最终实现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了。

注 释：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0页。

②④⑤⑦⑧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01、411、403、404、497页。

③⑦ B·B·斯托克里茨卡娅—捷列什柯维奇：《中世纪城市史基本问题》，莫斯科1960年版，第281页。

⑥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中近东封建主义时代的商品货币关系》，莫斯科1980年版，第180、182—183、178、181—183、180、185—186、32页。

⑨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94章。

⑩ 汪大渊：《岛夷志略》，沙里八丹条。

⑪⑫⑬ 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97、187—188、190页。

⑭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⑮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⑯⑰ 鲁克·克文教：《游牧帝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第2期，第137、140—141页。